

Study on the Mongolia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of Chinese classic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lima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ner Mongol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10,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turning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played a vital role, which not only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but also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the Mongolian culture.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bridge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Mongolian and Han, but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It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re worth our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mem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main content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Mongolia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this period.

Key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classics; Mongolia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清末民初中华典籍蒙译活动研究

阿力玛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国·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

在清末民初这一历史转折时期, 中华经典的蒙文翻译活动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不仅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融, 还深刻影响了蒙古族的文化发展轨迹。清末民初中华经典的蒙文翻译活动是蒙汉文化交流的桥梁, 更是推动民族文化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 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与铭记。本文对该时期中华经典蒙文翻译活动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深远意义与影响的精炼探讨。

关键词

清末民初; 中华典籍; 蒙译活动

1 引言

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变革、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中华典籍的蒙译活动, 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当时, 随着社会的动荡和变革, 各种思想文化交流碰撞, 蒙古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一员, 也积极参与到这一交流过程中。中华典籍的蒙译, 不仅促进了蒙古族对中原文化的了解和吸收, 也推动了蒙汉文化的交融与蒙古族文化的发展。

清末民初的中华典籍蒙译活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

难, 比如语言差异、文化隔阂等等。但正是这些挑战和困难, 也促使着译者们不断努力, 采用各种翻译策略和手段, 力求准确传达原著的精髓和内涵。清末民初的中华典籍蒙译活动, 在推动蒙汉文化交流、促进民族文化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2 清末民初中华典籍蒙译活动的背景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期,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 蒙古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一员, 在与汉族等民族的交流中, 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金项目】北疆文化研究工程—北疆文化跨学科综合研究项目《清末民初时期蒙汉民族语言文化交融与共同发展实证研究》的部分内容。

【作者简介】阿力玛(1986-), 女, 蒙古族, 中国内蒙古赤峰人, 硕士, 副研究员, 从事蒙古文献研究与翻译学研究。

清朝的封建统治受到挑战,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发生了如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使得国家主权和民族安全受到威胁。清朝的“变法”“戊戌变法”等尝试改革的尝试失败,引发了国内的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的高涨,如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朝末年,民族主义、革命思想的兴起,最终导致了清朝的灭亡和民国的成立。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需要整合和统一国内的多元文化,包括对蒙古族文化的接纳与融合。

经济的重心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清末受西方影响,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影响逐渐深入,对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多民族经济模式也产生了冲击。直到19世纪中叶,蒙古地区除毗连内地者外,还有大部分地区尚停留于封建领主制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社会上的商品交换,仍局限于原始的以物易物状态,畜牧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的商品率极低。自从蒙古市场对外对内开放以后,这里的商业贸易逐渐兴盛。^①经济的变化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思想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

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在教育、文学和语言的交流中,蒙古族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与汉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带来了新的文学作品和思想观念,对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其他民族文化产生了影响。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如推翻了清朝的满汉隔离政策,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国际关系的新环境下,蒙古族的语言、文化传统与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加速。如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分为四院,其中的外院就是小学堂,这是我国公立小学的始祖,它揭开了中国近代小学教育的序幕,给固步自封的蒙学教育带来了强劲的冲击。1901年,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清政府进行了“新政”改革,废除科举,建立了近代学制,将蒙学纳入官学体制,并对蒙学教学内容、方法、教材等进行变革。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依据《蒙学堂章程》,蒙学教育确立了“培养儿童浅近知识,调护身体”的教育宗旨,清代蒙学教育走上了快速革新的道路。^②

清朝的灭亡和民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的多民族关系,改变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各民族文化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互动更加密切,特别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下,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对蒙古族文化的影响尤为明显。新的民族政策和相对开放的文化交流活动为蒙古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清末民初的中华典籍蒙译活动,特别是涉及清末民初教育、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蒙古语翻译活动,反映了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刻变革,也反映了蒙古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3 清末民初中华典籍蒙译活动的主要内容

儒家经典蒙译是清末民初中华典籍蒙译活动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这一时期,众多儒家经典被译成蒙古文,使得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在内蒙古地区广泛传播。这一传播过程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蒙汉民族之间语言文字的交流与互融,加深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理解和友谊,还有力地推动了儒家文化在蒙古族地区的深入传播与蓬勃发展,为蒙古族的文化教育和社会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

清末民初,首先大量的儒家经典被译成蒙古文,使得蒙古族民众能够直接阅读和理解这些经典著作。这些蒙译儒家经典往往以多语言形式出现,如满蒙汉对照本、蒙汉对照本等,这极大地方便了蒙古族民众的学习和理解。通过阅读这些经典,蒙古族学者和民众不断学习中原文化,吸收了很多新的知识和思想。其次,蒙译活动促进了蒙汉民族之间语言文字的交流互融。在蒙译过程中,蒙古族学者和汉族学者共同合作,使得两种语言在翻译中得以相互借鉴和融合。这不仅提高了蒙古族的语言文字水平,也增进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如《四书》的蒙译。《四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它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清末民初,随着中华典籍蒙译活动的兴起,这些译本在蒙古族地区流传甚广,对蒙古族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素养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发现的《四书》蒙古译本中,最早且极具历史价值的版本是由著名学者土默特·嘎拉桑于清光绪十八年(即公元1892年)蒙译并精心刊行的木刻版《御制翻译四书》。随后,特睦格图嘎拉桑译本为基础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蒙古文翻译工作,使得译本在保留原意的同时,更加贴合蒙古语的表达习惯。此外,还有多位学者如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的未署名译者、哈图、苏图以及乌·那木吉拉等人翻译的版本,他们的翻译工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考和借鉴之前已有的译本进行了跟译或修订,但使《四书》的蒙古译本更加完善、准确,从而推动了《四书》蒙译本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与影响。

目前整理出来的中华典籍《四书》的蒙文译编版本60多种。其中收藏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蒙文译编《四书》和《四书》的解释共22种版本(图1),占了总数的1/3。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不同著作的多个版本。这一时期的《四书》译编在数量和传播上均有显著增长,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对文化教育的重视。

在学术研究中我们比较常用的是民国时期《四书》的蒙古文译本是1924年由特睦格图蒙古文书社的《蒙汉合璧四书》(图2)。这部译本是以清代《御制翻译四书》(图3)为底本进行翻译,保留了民国时期的蒙古文特点。这些珍贵的存世译本现藏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为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对于深入了解民国时期蒙古地区对儒家经典的传承与解读具有重要意义。

	书名	译者	刊行时间	书写形式	开本
1	御制翻译四书	宋代朱熹编写，清代噶桑译	光绪十八年（1892）	木刻本	27.5×20cm
2	御制翻译四书	宋代朱熹编写，清代噶桑译	清末	木刻本	23.8×15.2cm
3	御制翻译四书	宋代朱熹编写，译者不详	清末	手抄本	25.9×12.7cm
4	蒙译四书	宋代朱熹编写，译者不详	清末	手抄本	36.2×23cm
5	日讲四书解义	不详	清代时期	木刻本 / 手抄本	36.4×21.6cm
6	论语	不详	清末	木刻本	26.7×19.5cm
7	蒙译论语	不详	清末	手抄本	26.3×13cm
8	孟子	不详	清末	木刻本	27.8×19.9cm
9	孟子	不详	清末	手抄本	23.4×13cm
10	大学	噶勒藏译	光绪十八年（1892）	木刻本	27.5×19.9cm
11	大学	不详	清末	手抄本	22.5×11.7cm
12	大学	不详	清末	手抄本	23.6×12.2cm
13	大学衍义	真德秀编写	清末	手抄本	26.2×cm
14	中庸	不详	清同治四年	手抄本（伊湛纳希抄写）	22.7×12.9cm
15	中庸	不详	清末	木刻本	26.5×19.9cm
16	中庸	不详	清末	手抄本	19.8×14.4cm
17	蒙汉合璧四书	宋代朱熹编写，译者不详	民国十三年（1924）	铅版（北京蒙古文书社）	21×14.2cm
18	四书	宋代朱熹编写，译者不详	民国时期	手抄本	24.9×20.7cm
19	论语	不详	民国时期	手抄本	23.3×13.1cm
20	大学	不详	民国时期	铅版（北京蒙古文书社）	25.3×5.1cm
21	本蒙汉合璧大学读	察哈尔蒙古图书编译馆	民国时期	铅版	27.2×16.9cm
22	中庸	不详	民国十五年	手抄本	25.4×12.4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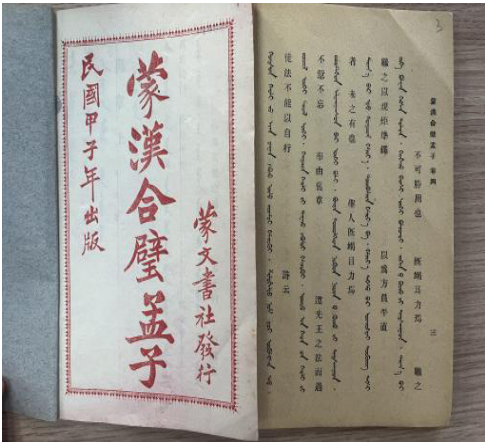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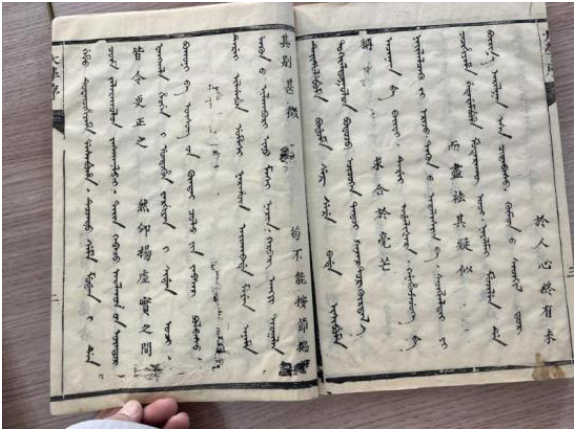


图 3

儒家经典外,清末民初还进行了大量的其他中华典籍的蒙译工作。在这一期,蒙古族地区设立了许多学校、书社、专门培养蒙古文翻译人才。“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蒙古族的新文化运动趋向高涨,蒙古人创办的文化出版机构接连成立。”^③此时,特睦格图(汉名汪睿昌)创办了北京蒙古文书社,出版《辽史》《金史》《藏经》《西汉演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及《蒙语会话》《成吉思汗传》《蒙古黄金史》等经典著作。尽管印数不多,但印刷质量上乘,对蒙古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30年蒙古文书社迁至南京,专门承印教育部、蒙藏委员会和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的蒙藏汉文书刊、公文和教科书,1934年停业。1926年,若勒格尔扎布、克兴额和拉西僧格三人募捐创办了东蒙古书局,搜集了许多珍贵的满蒙文旧籍和民间文学作品并列入出版计划,还编译出版了一批教科书和工具书,如《初学国语》《蒙文小学教科书》《详解蒙古语字典》《蒙汉合璧字典》《三合便览》,以及许多有关历史、语言、文学方面的典籍。此外,克兴额还亲自翻译了《聊斋志异》,被誉为“翻译作品的典范”这些书社不仅教授蒙古文,还注重中华经典的教育和传承。

清末民初蒙译活动通过翻译中华经典促进语言文字交流互融,有力地推动了中华经典文化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中华经典翻译不仅丰富了蒙古族的精神文化生活,还增强了汉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蒙译中华经典的活动使得蒙古族学者能够通过阅读和研究这些经典获得更多的知识。清末民初的蒙译中华经典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文字的直接翻译,还包括了多语言文本的创作,如满汉、满蒙对照本。这种多语种的文本创作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多语种文化遗产。

4 清末民初中华典籍蒙译活动的意义与影响

4.1 促进民族融合

蒙译中华典籍使得蒙古族人民能够更深入地了解 and 欣赏中原文化的精髓。这些典籍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为蒙古族人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文化视野。通过阅读和理解这些典籍,蒙古族人民不仅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还促进了与汉族等民族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相互理解。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为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蒙译典籍的传播也极大地推动了蒙古族地区的文化进步和发展。一方面,这些典籍为蒙古族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满足了他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蒙译典籍的出版和传播也促进了蒙古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为当地的经济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蒙译典籍还为蒙古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教材和资源,有助于提高当地人民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

通过蒙译中华典籍,蒙古族与汉族等民族之间的文化

交流得到了显著加强,这不仅有助于促进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还极大地推动了蒙古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和进步。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交融和互鉴,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4.2 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清末民初的中华典籍蒙译活动,其深远意义不仅局限于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在于对蒙古族文化的丰富与发展。这一时期的译著工作,不仅是一项语言转换的任务,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

通过这些译著的出版,中华文化在蒙古族地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和深入接受。这些典籍涵盖了儒家经典、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等多个领域,为蒙古族人民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知识资源。它们不仅让蒙古族人民有机会直接接触和理解中原文化的精髓,更激发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浓厚兴趣和热爱。同时,这些译著的出版和传播也极大地丰富了蒙古族文化的内涵。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们往往结合蒙古族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特点,对原文进行适当的调整和解释,使得译著更加贴近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这种文化上的融合与创新,不仅促进了蒙古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也增强了蒙古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此外,这些译著提高了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也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通过学习和理解这些译著,蒙古族青年一代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中。

4.3 对后世的影响

清末民初的中华典籍蒙译活动,无疑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一时期的蒙译活动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们不仅力求准确传达原著的意思,还往往附加注释和解说,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注释和解说不仅包含了译者对原著的解读,还融入了他们对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因此,这些译著不仅具有语言学上的价值,更在历史、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通过研读这些译著,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末民初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征,为学术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

其次,现代蒙古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也从中受益匪浅。这些译著的出版为蒙古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在教育实践中,教师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译著作为教材或辅助材料,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中华文化。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还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此外,清末民初的中华典籍蒙译活动还为现代翻译事业树立了榜样。这一时期的译者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湛的翻译技艺,为后世树立了翻译工作的典范。他们的翻译

成果不仅准确传达了原文的意思，还保留了原著的风格和韵味。这为我们今天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激励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总之，清末民初的中华典籍蒙译活动对民族团结、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以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现代蒙古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同时，它还为我们今天的翻译事业树立了榜样，激励我们不断追求翻译的准确性和艺术性。

5 总结

清末民初的中华典籍蒙译活动是一次深刻的文化交流实践，它再次证明了文化交流在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珍视这样的文化交流机会，积极推动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为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清末民初的中华典籍蒙译活动对我们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该积极借鉴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推动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强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传承，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 [1] 《蒙古族简史》编写组：《蒙古族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88-189
- [2] 张有龙.论清末民初蒙学教育的转型之路[J].兰台世界,2015(09):39-40.
- [3] 《蒙古族简史》编写组：《蒙古族简史》（修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368页。